



逯宏 著

中国五帝时代

——北方传说时代多元文化融合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逯宏著

中国五帝时代

——北方传说时代多元文化融合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五帝时代：北方传说时代多元文化融合研究 / 逯宏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 6

ISBN 978 - 7 - 5161 - 9920 - 6

I. ①中… II. ①逯… III. ①文化史—研究—中国—
三皇五帝时代 IV. ①K21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41961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选题策划 刘志兵
责任编辑 耿晓明
责任校对 郝阳洋
责任印制 李寡寡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7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22
插 页 2
字 数 343 千字
定 价 81.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一

逯宏送来《中国五帝时代——北方传说时代多元文化融合研究》书稿要我作序，我心情复杂，有惶愧、自责，更有欣慰，感到为难又不能不勉为其难。

逯宏来自辽西建平县农村，当年因由我指导他的本科毕业论文而相识。他诚朴好学，也是在艰困中通过自学完成大学学业的，与我三十年前的经历有相似处，所以有种惺惺相惜的感觉。

2002年逯宏考为辽大硕士生，我给他们这批研究生讲过古代美学范畴生成史的课。记得课后交流中他告诉我：老家山上很容易就能捡到红山文化的陶器碎片，曾试着拼成图案，老想知道四五千年前这里的人是怎么生活的。

红山文化遗存主要分布于冀北、辽西地区，逯宏对出生地附近的考古发现兴趣浓厚，有难解的情结。尽管他不归我指导，也鼓励他留意学术界相关研究的进展，抓住这个课题。红山文化牛河梁遗址作为20世纪最晚发现的大型上古文化遗存，首次证实辽河流域也是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起源地，且与黄帝、少皞族有联系。这一研究方向于他岂非最适宜吗？

得其指导老师支持，逯宏将“红山文化”作为自己的硕士论文选题。我很为他高兴，深知自己才学给不了他多少帮助，于是向他强调转益多师的重要。既然是研究生，就要多向自己的导师（当时为辽宁大学的毕宝魁老师，随后还有北师大尚学锋老师、陕西师大的刘生良老师）以及其他史前文化学者的著述请益。

研究红山文化不可能孤立进行，必与其他文化源起相联系，由此他沉潜于中华史前文化的全面研讨。也许是涉及面过宽的缘故，他最初设

想的博士论文题和博士后选题都因属“文明起源”而未果。不过，即使在从事后来拟定的博士和博士后课题的研究中，他也未搁置对考古新发现和中华文化多元融合的思考，本书正是逯宏多年来探究中华文化起源的记录。

十三年前就建议他要抓住红山文化的课题是否适合其学习工作的条件和需要呢？倘若因此影响他的学业，影响到所在院校要求他承担的教学、科研任务，那我是作了怎样的一种误导？此即我的惶愧、自责之处。当然，读毕书稿又颇感欣慰，觉得其论确有不懈求索中的斩获，有突破性的建树。

我于史前文化仅是偶有涉猎，未对中华文明起源问题作过专门研究，如何能中肯地评介本书得失呢，作序确实为难！然而书稿读来我受教匪浅，感佩不已：以为逯宏对中华文化构成多元因素互动与融合过程的宣示具有开创性；其探讨问题的思路、资料和对相关研究成果的广泛征引以及严谨的辨识、综论都相当有说服力。

论题虽属撰著者自设，但确与当初我的鼓动相关，他十来年锲而不舍地爬梳、求索既有所得，作序的请求也就不容我推诿，唯勉力为之而已。尽管以我的认知和感悟写来不免浅陋偏颇，也不妨对书稿的成就得失作尽可能客观的推介。

中华文明的起源从来是学者重视的问题，探索从未停步。

逯宏认为，中国古文化研究，无论运用来自西方的“青铜时代”概念，或是中国学者使用的神话传说和考古学两套话语撰述，都难免成为“夹生饭”。以为“结合田野考古新资料重建与传世文献兼容的上古观念架构”是史学发展的必然趋势。以“五帝时代”为题，是用传统史学固有概念指代近百年考古发现的上古历史遗存的生成期，从而将传说与考古两套古史系整合为一。

提及中国历史，人们常说“上下五千年”，大致是以中国第一部通史《史记》的记载为依据的。司马迁上溯到的五帝时代约在公元前三千余年，其时中国尚处于神话传说时期：三皇是半神半人的始祖，而五帝时的社会形态则已是跨地域、有中心的部族联盟，中华文化汇融而成的征候更为明显。有关三皇的争议较大，而五帝为谁的分歧少些。《史记·五帝本纪》载黄帝轩辕氏、颛顼高阳氏、帝喾高辛氏、唐尧、虞

舜史事。篇末司马迁明言：“学者多称五帝尚矣”，“尚”是久远之义；孔子亦传五帝事；又说：“余尝西至空峒，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且有自己从《春秋》《国语》有关五帝记载中的“发明”。可知《五帝本纪》史料的来源及其立为《史记》本纪首篇的所以然。汉代典籍（如《大戴礼记》《白虎通》）也多认为五帝即黄帝、颛顼、帝喾、尧、舜。逯宏的论题是成立的。

20 世纪有众多上古文化遗址的重大发现：从二三十年代起陆续发现的仰韶文化（公元前 5000 年至前 3000 年），良渚文化（公元前 3300 年至前 2000 年），龙山文化（公元前 2600 年至前 2000 年）；50 年代发现的半坡遗址（公元前 4900 年至前 3800 年），大汶口文化（公元前 4200 年至前 2600 年）；70 年代发现和发掘的河姆渡文化（公元前 5000 年至前 4000 年）。1921 年，考古学者首次收集并报道了有关红山文化（公元前 4000 年至前 3000 年）的遗存资料，但直到 80 年代牛河梁等遗址发掘后，红山文化才引起广泛注意。牛河梁等遗址发现最晚，却证实辽河流域也是中华文化重要源头之一。这些发现帮助学者们不断地补充和修正原来的认识和结论，大大推动了上古历史文化的研究。

逯宏指出：受西学东渐影响，民国早期很多学者认为中华文明是自西方传入的；主要分布于黄河中游的仰韶文化发现之后，学界有以黄河流域为中华文明的摇篮的“黄河文明中心说”，夏鼐的《中国文明的起源》为其代表作；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发现红山文化牛河梁遗址，北京大学苏秉琦先生（原中国考古学会会长）在《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中提出中国文明起源的“满天星斗说”，否定了“黄河文明中心说”。这样在中原仰韶文化之外，冀北辽西的红山文化、黄河下游（山东）的大汶口文化、长江下游太湖地区的良渚文化，以及时代稍后的中原龙山诸文化、巢湖地区（安徽）的凌家滩文化，等等，都受到中华文明起源研究学者的重视。

传统上古史观是一元的，考古发现的中华文明起源是多元的；苏秉琦先生的“满天星斗说”虽与考古发现的实际相吻合，却没有指明多元的源头如何融汇为一，即形成在五帝时代业已廓定的文明形态。本书力求梳理考古发现及其相关成果，并进一步考论，多元文明是如何互动

并最终形成中华文明的主流的，从而与传世文献中一元的上古史观相吻合，以求文明史研究的贯通与全面展示。

通过对历史资料、考古发现和前辈学者成果的学习研讨，逯宏补充修正了以往的认识和结论，从以下几个层面对多元的中华文明源头进行了梳理整合：

书稿第一章中指出：“天都”“人国”“地府”是传统观念里的“三界”；有此，则表明五帝时代人们既注意到“物的世界”，也注意到“精神世界”。

在“天都”的讨论中作了关于昆仑山地望的考证：“昆仑山”是中国神话名山，但地望在哪里一直无定论。李炳海先生考定“昆仑山”在鄂尔多斯地区（内蒙古黄河南岸），逯宏则以为“帝之下都”在阴山地区，与鄂尔多斯隔黄河相望。

关于轩辕古国：苏秉琦先生指出，黄帝早期传说与红山文化时空框架相对应，但说得简略。逯宏在第一章第二节对“人国”做了详细论证。

幽都在北方，是人观念里的“鬼府”。逯宏指出，幽都与祭祀祖先神灵相关，是“鬼府”的原型，具体说就是牛河梁的积石冢群。这是以往未曾有过的见解。

第二章讨论古代族群婚姻关系，其中的重要收获在于能认识龙族与凤族间的婚盟关系。炎帝之后姜氏、黄帝之后姬氏的婚盟广为人知，而本书揭示龙凤婚盟出现的时间更早，持续时间更长，影响更大。另外，从龙凤婚盟切入，可以理顺先夏人与先商人之间的关系。

第三章探究五行制度，是本书的关键性论证。国内外研究中国文明起源的专著不少，但多回避“五行”的讨论。可能受顾颉刚等“古史辨派”影响，以为“五行”是战国时邹衍等人提出来的，早期文献里提及的“五行”都属伪造。逯宏通过论证指出，原始五行制度从黄帝时代出现到夏启时代崩溃，持续了一千多年。

第四章讲的是战争。战争是不同族群间文化冲突与交流最剧烈的形式。此章进一步明确以下三个方面：

（1）冀北红山文化是黄帝族留下的；中原仰韶文化是炎帝族留下的；山东早期大汶口文化是蚩尤族留下的，晚期大汶口地区被少皞族

(红山文化一支)控制,而蚩尤族后裔依旧在这一地区社会底层生存。此为第一章内容的补充——第一章是静态地将古史传说与考古资料对应,而第四章是作动态的对应。

(2)原始五行制度在战争中转型、崩溃:战争是社会矛盾的激化,往往直接推动社会制度的变革;颛顼“绝地天通”是对原始五行制度的第一次变革;夏启与有扈氏的战争,是对原始五行制的第二次变革(更准确地说是破坏)。这是第三章内容的延续。

(3)龙凤婚盟与原始五行制度密联系:中央部落首领由龙、凤两族首领交替担任,其实是舅舅传给外甥;如果孩子只知道父亲的族属,而不知道是具体是哪个男人(原始伙婚就是甲族男人们与乙族女人们整体结合),就只好随母居;这样,舅舅传位给外甥,其实就是在同一个集团内传位。鲧、禹、启时代,大约专偶婚出现了,孩子改从父居,所以禹就会传位给龙族之子(启),而不再传位给龙族之甥(益,凤族之子)。可以说是第二章内容的延续。

第五章讲信仰。前四章侧重“实”的层面;第五章则侧重“虚”的层面。实与虚,在一定条件下会相互转化:古史传说与考古资料,既有反映“史实”的,也有反映的精神层面。依传统史观,伏羲与女娲有始祖意味,在五帝前的传说中,书稿中将对他们的崇拜归入古人原始的精神信仰范畴。

逯宏广泛罗集资料和相关的研究成果,梳理、整合中外探讨文化渊源的各种视角和学说之优长,综论中国上古族群的婚姻关系、精神信仰、思想观念以及战争等因素对中华文化特征形成的影响,是上古史研究上颇具创意、很有价值的尝试。

当然,考古还会有新发现,研讨还会有新成果,补正、整合不会终止。逯宏此书中这些有价值的总结仍然是阶段性的。

书稿也难免有不足之处,逯宏自己也意识到对“良渚文化”相关材料的采撷和讨论薄弱是个重要缺憾。而我还有一种感觉,综论中须强化五帝时期各族群生存方式、社会生产力、生产关系方面的述评,更要显现作者兼取各家所长又使之互为补充的思想方法和科学态度。

比如上古时代有这样的分期: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铁器时代。这种提法确为舶来品,20世纪初它为中国学者认同和

采用，也不无理由。只说二十五史不存在“青铜时代”这个词以及国人“理解不到位”，不如以考古发现的各族群精神崇拜、生产生活相关的器物、工具为据进行论证，“五帝时代”不受限于“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的分际更方便也更有说服力。此外，华夏文明的一个特点是对玉的崇拜，可补强玉器的发现和功用这一侧面：古人认为玉坚实而莹洁温润，有德性、有品格、通神灵，广泛用作祭祀礼器，也能制成玉龙、玉龟、玉鸟、玉鱼、玉牒、玉刀等饰物和器具，有文化特色鲜明。何况这正是五帝时代一些文化遗存中很有价值的发现。玉器的运用跨越了新石器晚期、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也可以成为本书以“五帝时代”为题的缘由之一。

涂光社

2016年12月于辽大崇山校区

序 二

逯宏博士后撰写的《中国五帝时代——北方传说时代多元文化融合研究》一书即将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作为合作导师，我应其请求，乐意讲几句话，作为序言。

天地玄黄，宇宙洪荒。传说中的中国五帝时代非常悠远，何其茫然！太史公司马迁在作通史《史记》时，有感于“维昔黄帝，法天则地，四圣遵序，各成法度”而作《五帝本纪》第一，但他当时就深感学者多称的五帝，时代过于久远，“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因而大多难以据信；唯“《尚书》独载尧以来”，较为可靠。他蒐集有限资料，依据孔子所传《五帝德》《帝系姓》两篇文献及《尚书》中的相关记载，参验《左传》《国语》的某些发明，结合自己到各地游历所得到的部分口传资料，经过慎重甄别，“择其言尤雅者”加以整合，写成了这篇本纪，依次记叙了五帝的品德、才能和功业，勾勒出从黄帝到虞舜这一传说时代的大致历史进程，反映了当时部落战争与统一、首领推举与禅让和国家肇基、制度草创以至初具规模的实际情形，从一个层面上揭示了我国早期社会发展、文明进步的基本情况。然而司马迁所写的这篇本纪及所整合的五帝谱系，后世学者却一直颇有疑问。诸多疑难问题，同样由于材料奇缺，加之研究视野和方法所限，始终难以理清，一直没有得到合理解决。于是，信以传信，疑以传疑，所谓五帝时代尤其是关于炎黄的一些问题，差不多成了谁也无法说清的一笔糊涂账。逯宏君十多年来对此十分关注，凭借自己来自辽西，对当地新石器时代红山文化遗址的考古发掘与研究比较了解的优势，选择这一难度巨大又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和意义的课题进行探险性研究，试图依托红山文化的研究成果，从多元文化融合的视角，综合运用多重证据，破解关于五帝时代

的部分难题，解开诸多谜团，厘正长期存在的某些误解，以重建远古史观。本书即是他对这一课题多年思考与钻研之收获的阶段性呈现。

红山文化最初发现于辽宁西部和内蒙古赤峰（时均属热河省），其分布遍及今冀、蒙、辽交会处的广大地区，因早期发掘多集中于赤峰红山一带，遂命名为“红山文化”。红山文化的考古发掘与研究表明，西辽河流域也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之一。逯宏君立足于此，检索整理并审视传说中五帝时代的相关文献资料，惊奇地发现关于黄帝的传说和记载多与红山文化的时空范围相对应，以动物（龙凤）为图腾的黄帝龙族团是北方草原地区的游牧部族，以植物（花）为图腾的炎帝华族团是中原黄河流域的农耕部族，他们所代表的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及其内部支系间的冲突与交融，构成了五帝时代社会生活和文化发展的基本内容，从而找到了一把打开远古神秘时空的锁钥，进而结合对传世文献记载的辨证，提出一系列重要见解与发明，对诸多疑难问题做出了新的考证和阐述。

本书除绪论和结语外，主要由五章组成，依次考论三界地理原型、史前婚姻联盟、原始五行制度、远古战争神话和伏羲女娲信仰。按其章节顺序，我以为其重要发明和新见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首先是关于三界地理的考索。他综合传世文献与考古资料，认为昆仑神山的地望在今内蒙古中南部的阴山地区；轩辕古国在今河北北部、内蒙古东南部、辽宁西部的森林草原间；而最初的幽都鬼府原型，则是红山文化牛河梁积石冢群遗址。概言之，北纬40°以北西起阴山东至燕山一带的广大地区，是以黄帝为首领的龙族团早期活动的历史舞台。这就从红山文化的视角，为传说中的黄帝时代建构了文化地理上的新坐标。

其次讨论史前婚姻联盟。他从黄帝的婚姻入手，在人多知道的华族团炎帝之后姜氏与龙族团黄帝之后姬氏间的婚盟之外，依据红山文化中玉龙与玉凤共出等现象，首次揭示出龙族团内部最主要的龙族与凤族间的婚盟，这是出现时间更早、持续时间更长、对后世影响更大的婚姻联盟。同时指出，由于母系社会孩子通常随母亲生活在舅氏家族，也可以说是甥随舅居，舅为龙族则甥为凤族，舅为凤族则甥为龙族，太皞与少皞的关系就是如此，从黄帝至大禹一千余年的时间里都是如此。以龙凤婚盟为切入点，考察帝喾的婚姻，也可以理顺先夏人与先商人之间的关

系。这就为学界提供了关于黄帝族团内部主要婚姻形态、部族关系及其文化联系与交融的新认识。再次探究原始五行制度。他摆脱“古史辨派”的成见，参考相关传说和红山文化区出土的类似“玄珠”的玉雕龙，对“黄帝四面”作了新的阐释，提出原始五行制是由黄帝创立的新观点。他认为，原始五行制就是东、南、西、北四方部落首领交汇于中央，共同组成五方部落联盟的制度，它与婚姻联盟交织在一起，本质上又与原始禅让制同构。这种制度能在比较落后的条件下有效凝聚各个部落，形成强大的合力，故从黄帝创始到夏启终结，持续了一千多年。而从匈奴铁骑到满洲八旗，在中国北方的森林草原间也很容易找到这种制度的活化石。这就使我们获得了五帝时代社会组织形式、政治体制、文化交流机制及部族间互动融通纽带的新认知。

随后阐述远古战争神话。他认为，战争是不同族群间文化冲突与交流的最剧烈的形式，从来都是外部或内部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并推动社会变革。自黄帝以来，贯穿于史前战争的矛盾主线是：前期、中期以龙族团与华族团的矛盾为主，后期以龙凤联盟内夏人与夷人的矛盾为主。前期主要表现为以黄帝为首的龙族团因气候和环境变化不得不挥师南下，在今河北张家口地区的阪泉、涿鹿同以炎帝为首的华族团进行的一场大战，结果炎帝战败，蚩尤被杀，导致华族团分裂，炎帝姜氏族与黄帝族组成新的婚姻联盟，即炎黄联盟，炎帝后裔逐渐加入到黄帝所建立的原始五行制度中来，但中央盟联的权力一直掌握在龙凤族团手里，由龙、凤两族舅甥相传轮流担任首领。由阪泉、涿鹿之战可以进一步确认，北方红山文化是黄帝族留下的，中原仰韶文化是炎帝族留下的，山东大汶口文化早期是蚩尤族留下的，晚期则为少皞族（红山文化一支）之遗迹。中期，龙族团进入中原向南发展，在很长时间内仍断断续续地与华族团支系发生冲突，如九黎乱德、共工与颛顼争帝等，都可以说是炎黄斗争的延续。面对各种挑战，帝颛顼实施了“绝地天通”的宗教改革，把四方首领的祭天通神权和治民权分离，而中央帝依然集通神权与治民权于一身，使中央集权得以实现，原始五行制由此转型。后期，随着婚姻制度发展，男性渐获优势，龙凤族团内部龙族夏人与凤族夷人的矛盾凸显。大禹“归我子”的要求，表明当时社会正处于由母系向父系过渡阶段，龙凤婚盟出现裂痕；而伯益失权，夏启继位，以及夏启

与有扈氏的甘之战，则说明龙凤两族因帝位继承而产生的矛盾加深加剧，最终导致禅让制即原始五行制崩溃。

本章以阪泉、涿鹿之战为逻辑起点的分析阐论，既对远古战争神话作了深刻的文化透视和真相还原，又使我们对五帝时代的文化冲突与交融、文化因革与重构有了动态的历史体认。最后考论伏羲女娲信仰。逯宏认为，传统史观中被尊为创世配偶神或人祖神的伏羲女娲，只能视为古人的精神信仰，而无法作为历史真实或真实人物来看待。他发现西汉以前伏羲与女娲从未同时出现，因而根据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伏羲女娲陵庙、像石的分布规律，参考相关传说分别追溯，上下求索，进而发现战国时女娲的信众是楚人，由楚人上溯到颛顼再到黄帝，认定女娲最初是黄帝族所信仰的神灵。黄帝族留下的红山文化中女神崇拜的遗迹，或与女娲有关；红山文化东山嘴遗址的圆形祭坛，也似与“补天”关联；还有，黄帝女魃又曾在阪泉、涿鹿之战中于赤水（今河北赤城红河）止雨，据此，女娲及女魃都是以黄帝族的女巫师为原型的。而“华胥履迹生伏羲”与“姜嫄履迹生后稷”类似，表明伏羲与华胥氏、姜氏关系密切；伏羲远在神农、黄帝和太皞之前，可见他并非龙族的太皞，据此可以确定伏羲最初是华族崇拜的祖先神。八卦符号最基本的内涵是阴阳及其转化，所体现的正是华族农民的智慧；考古发现的半坡人面网纹盆边沿符号等文物，也似乎与伏羲画卦传说有关。第五章的梳理考论，显然是前四章内容的必要延展和重要补充，可进一步加固本书所构建的远古史观，以免因民间有关传说受到干扰。总之，本书立足红山文化视角，依托相关研究成果，全面照观和重新审视传世文献记载，对传说中的五帝时代做出了极富新意的探究和阐说，超越和突破了许多传统观点，理清了不少疑惑，从而初步建构起远古五帝时代多元文化融合的新体系和新史观，较好地实现了预定目标，创获甚多，创新性很强。

要完成这样一个难度甚大的研究课题，提出和确立自己的一系列新见解，建构自己的新体系，是颇不容易的。这既需要具备扎实的文献功底和深厚的理论修养，更需要对地上文物、出土文物和民间传说、民俗文化及其研究成果的准确把握和精审辨析；既要博览群书，借鉴前人和今人的研究方法和成果，更要独立思考，自辟新径，求真求实，勇于开拓创新。逯宏正是这样做的，或者说正是朝这个方向努力的。如本书第

一章关于三界地理的考证，就能体现这一特点。昆仑山是中国的神山，相当于古希腊的奥林匹斯山，但昆仑神山的地望却一直众说纷纭，大多以为在青藏高原或西域，有人提出在今内蒙境内黄河南岸的鄂尔多斯地区。逯宏则综观细察《史记》《尚书·禹贡》等书之记载，而依据《山海经》中的诸多线索，以雁门山、钟山、恒山为证，以河水、赤水、洋水、黑水为辅，又参验阴山岩画，把昆仑神山的地望进一步确定为今内蒙古境内黄河北岸的阴山地区；通过对“轩辕”诸说的平议，对轩辕、有熊与缙云氏的阐说和对涿鹿与新郑的比较，在前人基础上详细论证了黄帝传说与红山文化时空框架相对应的关系，从而得出轩辕氏乃称雄北方草原近千年的游牧部落，轩辕古国在今河北北部接近草原的地区，桥山在今河北涿鹿的新见解；又认为作为北方地名的幽都乃是作为观念中鬼府的原型，首次将其地点具体确定为牛河梁积石冢群遗址。往下考论黄帝四妃的传说、太皞与少皞的关系、龙凤婚姻联盟以及帝喾的婚姻、“玄鸟生商”神话乃至周人的文化渊源，阐释黄帝四面与建立五行、上古禅让传说、陶寺遗址与尧都平阳传说、若水地望与颛顼之虚及“绝地天通”，阐释“归子”传说、“五行”与“三正”、有扈氏与夷夏之争，解构伏羲女娲传说，考证女娲的原型与分化、伏羲与太皞的分合及八卦的草创等，都是如此，皆能将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物、考古资料等相结合，在相互印证中有所发明。20 世纪初，为解决学术研究中的一些疑难问题，王国维提出“二重证据法”，随后饶宗颐、叶舒宪等又进一步提出“多重证据法”和跨学科、跨文化等研究方法，并率先垂范，为学界提供了不少成功的研究范例。逯宏也将这些方法运用于本课题的研究之中，他聚焦一个个难题，往往罗列多重证据，综合运用文献学、考古学、文化人类学、历史地理学、神话学、宗教学、民族学、艺术学、语言文字学、符号学等原理和方法进行多层面的考辨和阐论，取得了较显著的成绩，做出了较突出的贡献，可以说为学界提供了又一运用多重证据、多学科融通法等解决重大疑难问题的范例。也正因为如此，本书视野开阔，材料丰富，探究较扎实深入，论述较严密到位，言之成理，具有较强的说服力，而且探幽抉奥，钩玄发微，新见迭出，胜义纷呈，读来令人耳目一新，显示出作者良好的学养与功力。与此同时，作者刻苦钻研、孜孜不倦的努力和艰辛劳动也不难想见。

本书考论的多是远古五帝时代的一些疑难问题，当然也不可避免地会存在一些缺点、不足甚或错误。新石器时代的长江流域同样星罗棋布地存在着古代文化，本书的副标题“北方传说时代多元文化融合研究”虽将其排除在外，但这些文化与黄河流域乃至北方草原文化的关联恐怕是客观存在的，如良渚文化、三星堆文化等，可见作者所建构的体系还不尽完善；作者对某些问题的探究，也显得力不从心，论证不尽充分。对此，逯宏本人已有清醒的认识。面对幽眇神秘的五帝时代这一老大难课题，材料极少，众说不一，要想其所有观点、判断全都正确无误，显然不大可能，因而书中诸多见解虽言之成理，也未必都很妥当。其中有些观点能否成立，还需要进一步研讨，专家和广大读者尽可批评指正。我对这一课题也并不熟悉，完全是在学习，只是因审阅书稿并探讨交流先学一步而已，所以连同我这篇小序，亦请专家学者一并批评指教。不过在我看来，即使本书存在一些缺点错误，也无论其观点能否全都成立，作者的治学精神和创新勇气当是可贵可嘉的，成绩是主要的可喜的，因此我对本书总体上还是非常赞赏的。

逯宏勤奋好学，对上古文化尤感兴趣，先后师从涂光社、毕宝魁、尚学锋等先生，因而有不少成果及本书面世。希望逯宏继续钻研，就中国文化的溯源探流等做出系列成果和更大贡献，以更多优秀新著嘉惠学林。

刘生良

2016年12月于陕师大雁塔校区

摘 要

从古史传说来看，昆仑神山、轩辕古国、幽都鬼府构成了横跨天神、人国、地府三界的上古神话时空。即便是先民想象的产物，也总会有历史原型的。综合传世文献与考古资料可知：昆仑山的原型在内蒙古阴山地区；轩辕古国在河北北部、内蒙古东南部、辽宁西部的森林、草原间；最初的幽都原型，在红山文化牛河梁遗址一带。总之，北纬40°以北的广大地域是龙族团最初活跃的历史舞台。而同一时期生活在黄河流域原始族群也有很多，他们有很多支系，共同特征是原始农业比较发达，可概称为华族团。

婚姻是维系各原始族群之间关系的第一条纽带。北方龙族团内部又可以分为很多支系，崇拜龙的部落与崇拜凤的部落之间存在着龙凤婚盟。先夏人和先商人，分别是龙凤两族的一支，也是早期龙凤联盟的主要组成部分。由于在早期婚姻形态下两性结合相对自由，族人辈分无法按父系计算，所以孩子通常随母亲生活在舅舅的氏族里，即舅舅为龙族则外甥为凤族，舅舅为凤族则外甥为龙族。也就是说，从黄帝至大禹一千余年的时间里，龙凤两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原始五行制度是维系各主要族群的第二条纽带。简单说，原始五行制就是东、南、西、北四方部落首领交会于中央，共同组成五方部落联盟的制度。原始五行制是由黄帝创立的，本质上是原始渔猎、游牧经济的产物。从匈奴铁骑到满洲八旗，在中国北方的森林草原间很容易找到这种制度的活化石。它简单而有效，很容易在比较落后的条件下迅速形成强大的力量中心。

战争从来都是社会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贯穿于史前战争中的矛盾主线有两条：前期、中期以龙族团与华族团的矛盾为主，后期以龙凤联

盟内夏人与夷人的矛盾为主。

距今 5000 年前后，东亚气候急剧变化，北方草原气温降低很多，降水大幅减少，龙族团的生存环境显著恶化。迫于生存压力，龙族团在联盟首领黄帝的带领下，挥师南下，于阪泉、涿鹿（即今河北北部张家口地区）同华族团发生大规模冲突，而此时华族团的重要首领有炎帝、蚩尤。战争的结果是炎帝战败、蚩尤被杀。继之，原始华族团四分五裂：炎帝姜氏族与黄帝族组成新的婚姻联盟，即炎黄联盟。同时，炎帝后裔也渐渐加入黄帝所建立的原始五行制度中来，但中央盟联的权力一直把持在龙凤族团的手里。

龙族与华族的矛盾延续了很长时间。九黎或战或和，艰难地生存于各地；三苗或南迁或西迁，并断断续续地与龙族团冲突。由于华族团长期生活于黄河流域，比北方龙族团更适应多水环境，所以当洪水与异族同时来袭时，龙族团以为洪水就是共工氏的“武器”。为应对各种挑战，帝颡顼实施了“绝地天通”的宗教改革：四方首领祭天通神权被分割出去，仅保留了治民权，也就是原来归一位部落首领的权力被分派给两个人；由于中央帝依然集通神权与治民权于一身，因而中央集权得以实现。尽管如此，中央帝还是觉得四方首领各自主政一方的权力太大了，于是便把他们的权力逐渐专门化，即由主政一方改为主管一类事务。水、火、金、木、土、谷被当时人认为是六件最重要的事，中央帝将土、谷管理权留在中央，其余四种被分别派给四方首领来管理，这样东正、南正、西正、北正就逐渐演化成了木正、火正、金正、水正。正，即是官。直到殷商时，官制里还有木正、火正、金正、水正和土正。

随着婚姻制度的发展，龙族团内部龙族夏人与凤族夷人也出现了矛盾。大约到夏禹时代，男人在两性生活中获得了相对优势，可以确定妻族中哪个孩子是自己的，哪个孩子不是自己的。在这样的条件下，有权势的男子就会要求将儿子纳入自己所在的氏族，按父系计算辈分。从传说来看，大禹就曾经提出过这样的要求（归我子）。如果依照原始五行制的老规矩，禹最终应该将中央帝位传给伯益（龙族之甥，凤族之子）；但是，孩子们离开舅族改从父居后，伯益成了外族之人，而龙族的长老们当然不愿意看到龙族的大权旁落外族。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